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对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

刘明远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结构，它既包括专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阶层经济生活条件的基本原理，还包括专门研究国家层面、国际经济关系层面、世界市场层面的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外在表现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需要抽象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基本原理支持，还需要具体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解读与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方面的服务，要想有效地满足这样的要求，运用马克思“六册结构”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是基本途径。

关键词：“六册结构”计划；辩证逻辑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8)03-022-09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学者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已经历几十年，虽然学者们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或体系，但就落实情况而言，至今要么难以让人满意，要么仍然处于企盼之中。那些已经推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基本上是本国现实经济政策与基本方略的描述，这样的理论体系不同于《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而是一些随着现实经济条件的变化，其内容也必须调整的体系，否则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可以有效地解释以往或当前正在实施的经济政策与基本方略，甚至对未来一段时期基本经济政策与基本方略的实施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它对解决未来的问题是否仍然有效，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执政党与政府的首要目标与基本任务，实现这样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任务既需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更需要行之有效的现实经济政策与基本方略，以及执政党强有力的领导，这一切反映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上来，一方面需要构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需要构建由一整套经济政策、基本方略组成的理论体系，而且后者应当以前者为理论基础，前者对后者的制定起指导作用，两者是抽象与具体、本质与现象、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本文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逐渐完善，需要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这样的体系不仅要有行之有效的具体经济政策与基本方略，还应当有指导这些政策与方略的制定、实施与改进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在构筑理论体系的思维行程中从抽象到具体完整地再现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的体系，以及理论要素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关系的发展过程。但是，无论过去、

收稿日期：2017-12-07

作者简介：刘明远(1961-)，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现在、还是将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问题,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是具体的经济政策与基本方略。在此基础上,“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形成一整套范畴和规律体系,然后运用辩证的逻辑方法将这些理论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叙述出来,也就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观念上被反映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理论工作者既要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经济政策与基本方略的研究,构建能有效解决当前经济发展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还应当借鉴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经济关系的研究,构建作为经济政策与基本方略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终形成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反应多层经济关系的理论总体。

二、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不仅为这门经济学规划了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结构、确定了研究方法 with 叙述方法,还为其创立了最基本的原理体系,其示范意义的理论成果就是马克思经济学“六册结构”计划与《资本论》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1857年8月),为他解剖“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著作制定了“五篇结构”计划。在此后的几个月内,经过调整又将其调整为“六册结构”计划(1858年2月),并且在之后的理论体系创作中对这个计划的细节性内容做了许多原则性提示(约有60多处提示)。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正式公布了“六册结构”计划。现有的马克思文献表明,马克思不仅从未放弃“六册结构”计划,而且还明确表示,在完成《资本论》后接着创作它的续篇。

学术界通过对马克思“五篇结构”计划与“六册结构”计划的具体方案以及众多相关提示的比较研究,已经基本上理清了“六册结构”计划基本逻辑结构与基本内容^①。

“六册结构”体系从最一般的抽象范畴“商品”开始上升到“货币”,再从货币上升到“资本”,从“资本一般”到“资本的竞争”再进入“信用”、“股份资本”,然后考察与资本相适应的“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在结束了对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考察之后,接着上升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承担者“国家”,继而又上升到“国家对外关系”,考察生产的国际关系,最后上升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的范畴“世界市场”。至于“资本”为什么是整个体系的起点,因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45}“世界市场”为什么是整个体系的终点,因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整个体系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安排结构、叙述内容、推演理论。马克思曾经指出,论“资本”这册书,是全部著作的“精髓”,^{[4]636}“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甚至认为,有了这册书,“余下的问题”,即使他自己来不及完成,“别人也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4]636}事实上,“六册结构”体系的前三册属于基本原理,依次研究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基本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后三册是在基本原理基础上在更大范围、更加具体层面上做一些基本叙述,属于较为具体的理论叙述。前三册是后三册的理论基础,后三册既是前三册理论的辩证发展,又是其具体化形式。

从抽象到具体是客观经济关系历史推移的反映。“六册结构”体系从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开始,直至回到最具体的范畴,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38}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六册结构”体系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具体理论的统一。因为理论叙述越是接近具体层面,经济关系越是具体,反映这些关系的理论概括也就越是具体,对现实经济政策、基本方略、策略的分析与论证就属于这个层面上的内容。由于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联系表现为:它是用前面已经阐明的抽象的规

定性去解释后面尚待阐明的比较具体的规定性,然后再用这个已经阐明的比较具体的规定性去解释后面尚待阐明的更为具体的规定性,依此循序渐进,直到说明所应考察的具体总体。从抽象到具体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是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较具体的关系是从比较简单的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比较抽象的规定性中包含着比较具体的规定性的萌芽。前者既先行于后者,也包括后者的基础。这种方法使马克思理论具有一个重要特点:任何一个具有复杂规定性的范畴,都不是一下子完整地表述出来,都不是下一个定义来概括的,而是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中逐步显现出其完整的内涵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叙述方法,才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全面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原生的、第二层、第三层、派生的、转移来的经济关系,才能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从简单到复杂、从本质到现象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一系列范畴与规律。

马克思在其有生之年完成的《资本论》的体系、结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典范,被恩格斯称作是马克思多年不断探索的结果,马克思本人也很重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5]恩格斯后来把这个方法视为“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6]《资本论》的方法是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唯一可行的方法,因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7]正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才达到了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目的,才创造了经得起历史和实践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所以,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应当以《资本论》的理论、方法、结构为指导,把《资本论》的理论作为基础,把《资本论》的方法作为根本方法。但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模仿《资本论》,必须创新,唯有创新才是出路。因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成功地模仿《资本论》的体系、结构、方法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许多版本采用了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结构,但理论叙述无一例外采用的是形式逻辑方法,若究其原因:一方面运用《资本论》方法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较大的难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急需的是反映政策、策略、方略层面的较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因而这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六册结构”理论体系,在原则上也适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依然存在着按生产要素分配形式,而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很有必要吸取马克思的这些研究成果。否则,理论体系就会背离中国国情,或者运用西方经济学方法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为什么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仍然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就是因为这个体系的范畴、理论没有客观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关系,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的本质关系与现象形态之间的必然联系,即经济规律,而是就现象形态进行描述,把现象形态的关系当作本质关系,把现象形态的规律当作本质规律,因而总体上仍然属于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辩护的学说。今天我们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想使其成为科学,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把各个层面经济关系加工为“经济范畴”,把各个层面的范畴与规律的内在联系加工成“基本原理”、“一般理论”,然后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将这些理论要素组合为一个辩证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是否科学,关键在于这个体系的理论要素是否属于客观经济关系的主观映像。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也很难逃脱类似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命运。

三、构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经验教训

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基本上都是从本国国情出发,描述

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列示本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及其原因、属性、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内容,反映这些层面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可以称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但严格说来不能算作基本原理,因为这些政策措施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才可以被称作基本原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初,由于缺乏可供参考的模式和实践经验,他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预见性结论,以及苏联的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限经验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个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两种形式,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有国营企业和合作(集体)经济;生产劳动者的劳动分为两部分:为自己的劳动和为社会的劳动;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工资是国营企业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借助商品、货币、信用等形式的基本职能,进行投资、计量劳动报酬、交换劳动产品、进行国家预算、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从而价值规律也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同价值规律有关的范畴依然存在;在国民经济一切环节和管理部门推行节约制度,以最少的消耗取得最好的成果;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实现国家工业化,生产的联合化、专业化、协作化,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经济的收益和农民的奉献;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通过合作制逐渐过度到农业集体化,其组织形式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由国家拨给,国家直接经营国营企业,企业盈利的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分留归企业支配,用于投资和奖励职工;国营企业按照合同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国家奖励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企业;国营企业之间按照供应合同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生产供应任务;保留一定范围的商业,其形式分为国营与合作社经营的商业(有组织的市场)、集体农庄经营的商业(无组织的市场),前者在商业流通中发挥决定作用,有组织的市场由国家定价,无组织的市场由市场定价;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国家集中的纯收入和企业收入、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国家财政体系包括国家预算、信用、保险等,国家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社会纯收入,信用是国家以一定的利息为条件、动员社会闲置资金用于国民经济的一种形式,其业务由银行和储金局办理;追求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社会产品的再生产通过实物和价值两种形式实现;主要通过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国民经济的电气化、化学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来发展经济,“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及规律;国家依据客观经济规律,保证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经营。……。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简称《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解读、论证、描述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这些具体经济政策、基本方略与对策。

我们从苏联《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可以看出其理论体系的构筑原则: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预见性结论,直接作为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予以阐述。二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由于《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社会主义部分没有做到从抽象到具体,也就是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简单的范畴出发对理论体系进行辩证的叙述,除了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产品经济等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经典著作中搬来的,能够反映本质与现象必然联系的“经济规律”之外,其余的几乎全是对现实经济政策的描述,其结果只能说明它们是现实经济活动的一些具体措施而已。《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逻辑结构与叙述方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该体系相继展开的内容中,一方面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以及这个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另一方面阐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经济政策。其排列顺序为:(1)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物质生产基础的形成过程;(2)依次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按劳分配原则等,这部分内容基本上属于《资本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预见性结论的阐述;(3)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出发,阐述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

生产、货币及其流通、价值规律、工资、成本与核算、商品流通、信用等范畴存在的原因、属性、作用、特征等,主要阐述这些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相比较的本质差别,以及这些范畴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过渡性特征;(4)阐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及其分配、财政体系与国家预算、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等经济政策。

作为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理论概括,《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之所以能被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当作典范加以接受,因为它对苏联成功解决那个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效率的、经济政策、策略的理论概括。所以,苏联《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初版可以被看作那个时代“苏联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被看作“苏联模式”的理论概括,其任务就是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政策、策略提供解读与论证。后来,由于“苏联模式”没有随着经济环境、经济结构、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结果造成体制僵化,政策失效,《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也就随之失去了它的现实基础,逐渐被边缘化。在随后的改革年代,苏联《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也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推出过几个修订版,内容随着经济体制制度、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但由于相关改革力度较小,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内容也只是以微调为主。这里以苏联解体之前的最后一版,即B. A. 梅德韦杰夫等编著的《政治经济学》为例予以说明,^[8]这一版中的社会主义部分依然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为”起点,依次展开的内容有:第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部分,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集约型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再生产。农工综合体再生产的特点;社会主义企业:经济运行活动的形式;再生产系统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机制(经济机制的内容、结构和模式;计划工作、价格形成和经济核算;财政、信用与货币流通;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组织)。第四部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体化;经济合作机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虽然在表述形式上与初版相比有一些变化,但其内容依然局限于政策层面,依然是对现行政策的解读,仍然属于政策、策略、方略类内容,不具备基本原理的特征。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先是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后又引进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这些“外来的东西”不符合中国国情,弊端与缺陷很快就显现出来。毛泽东针对“苏联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引以为鉴”“走自己的路”等主张,树立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典范。他在肯定了苏联《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贡献的同时,认为《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不讲逻辑,没有说服力,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不是从矛盾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只下定义,不讲道理,凭空提出一连串规律,却不是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现和证明规律……。受毛泽东的引导,中国学术界很快开始系统批判与反思“苏联模式”与《教科书》体系。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带领的研究团队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对“苏联模式”、苏联“教科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判性研究,同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主张运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构筑一个逻辑严密、理论完整、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并且经过努力在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以“产品价值”为核心,按照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这样的辩证发展过程安排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后经过曲折的研究、讨论、修改,最终在198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中予以公布。在对该体系的说明中,孙冶方强调要按照经济运动过程来安排理论体系,整个体系的主体部分由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全社会的总生产过程、消费等四篇组成,逻辑起点是“产品和商品”,理论内容发展的主线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使用价值)”,范畴的展开顺序依次为:产品和商品→价值与价格→货币→劳动→工资→企业→生产价格→资金循环→资金周转→交换→集市贸易→银行→社会再生产→综合平衡→国民收入→对外贸易→消费→经济管

理体制。构筑这样的体系与结构,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想构建一个类似于《资本论》那样学理性很强的、严整的理论体系,既包括基本原理,还包括对具体经济政策、策略的理论概括。但是,尽管孙冶方坚决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叙述应当从商品开始,但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试图既坚持劳动价值论,又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既坚持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又不放弃价值范畴;既想揭示经济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必然联系——经济规律,又不想运用辩证法逻辑方法进行理论叙述;既想坚持运用价值范畴进行成本与收益核算,又不承认生产要素与劳动成果的商品属性,所以理论体系的构筑无法克服逻辑上的矛盾与冲突,他的团队尽管经历了多年的探索与创作,但最终未能形成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除了孙冶方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之外,20世纪70、80年代,还有许多中国学者以《资本论》体系、结构、方法为指导,试图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三卷属于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著之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南方本、北方本)是这一时期编写的两部较有影响的教材。许涤新的著作虽然带有专著的性质,但其结构、叙述方式与“南方本”、“北方本”基本一致,都采用典型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结构,开始涉及“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与宏观调节”等内容,对现行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分析与描述依然是这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共同特征。后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基本国策逐渐形成与深入发展,尤其是随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方式逐渐开始转型,国家一系列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方面的政策陆续出台,“南方本”“北方本”的内容与结构也“与时俱进”,及时吸收国家制定出台的大政方针、政策、方略等,逻辑体系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作为理论叙述的起点,然后依次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主体、市场体系、经济运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的平衡与管理、对外经济关系等内容,理论体系的叙述方式基本上没有突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建设进入全面实施与逐步完善阶段,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制度建设的实践为依据,参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国家教委组织专家编写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称“国家教委本”),这套教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背景,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这样的线索安排结构体系,其思路对此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发挥了示范作用。例如,马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社会主义部分)》在继承了“国家教委本”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由张宇教授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被看作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编写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形式,甚至被称作中国学者近年来编写的最好的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除了“导论”之外,该教科书理论叙述的顺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中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与此前的一些版本相比较,张宇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充分吸收了近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如“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党对市场经济的领导”等理论,而且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同于苏联《教科书

(社会主义部分)》所阐述的理论,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

总之,构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些经验教训:(1)理论要素的选择、体系的构筑完全从本国实际与实践经验出发,而且主要围绕党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策略、方略等现实经济政策进行解读与论述。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筑的历史,就是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寻求答案的历史,就是构筑各种各样属于某一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2)构筑理论体系时虽然在形式上继承了《资本论》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这样的基本结构,也号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但事实上既没有做到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安排结构,也没有做到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理论叙述;既没有一个辩证的逻辑起点、按经济范畴排序的逻辑结构,也没有反映范畴的生成过程,以及范畴本身的发展、经济规律生成的逻辑依据,只是运用形式逻辑方法把现实经济政策及其术语按照时间、范围、发挥作用的顺序予以排序而已。(3)实践在先,理论体系的构筑在后,现实经济政策指导理论体系的构筑,而不是相反。每当现实经济政策能够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而适时做出调整、创新,就越是能够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社会和谐稳定。(4)由于现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上属于特定时期现实经济政策的解读与论证,现实经济政策的制定以问题为导向,反映这些政策的理论体系也是以问题为导向。所以这一学科的内容紧贴现实经济政策,当现实经济政策十分有效、十分成功的时候,反映这些政策的理论体系也被认为是“管用”的科学体系,对现实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一旦现实政策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反映这些政策的理论也就很快被边缘化,被遗弃。所以,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时效性、实用性、问题导向性。例如:作为“苏联模式”解读与论证的苏联《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为什么能够在推出之初很受欢迎,并且很快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国所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模式”的相关经济政策对苏联工业化、战时经济、战后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做到的经济奇迹。后来因为“苏联模式”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而适时调整,逐渐进入僵化状态,从而导致《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失去了生命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适时推出和调整经济政策,适时转变发展战略,从而创造了中国的发展奇迹。由于经济政策富有效率、发展战略精准,反映这些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充满活力。但是,这样的直接服务于国家现行经济政策、基本方略、基本国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难以提供其服务对象的基本原理,其基本原因是理论界没有运用抽象法把各个层面的经济关系归纳、综合为范畴,也没有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揭示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即经济规律,从而未能形成一个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四、一个运用“六册结构”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范例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而言,既需要对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进行解读与论证的政治经济学,更需要为其提供基本原理支持的政治经济学,唯有这样的结构才能在思维的进程中完整地再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才能够回答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策略、方略,以及为什么采用这样的经济政策、策略、方略。如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注重具体经济政策、基本方略、基本国策等层面的理论要素的探索与理论体系的构建,而忽视基本原理层面的理论要素的探讨与体系的构建,这势必会导致:(1)理论体系在方法论上的现象性描述;(2)理论要素在选择性上的随意性。其实,这两个因素

之间是因果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属性决定了其研究对象、方法、理论、结构应当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著作《资本论》保持一致,否则就成为另一种类型的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是从抽象到具体,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对材料进行加工、叙述。与此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整个体系也应当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结构展开内容,按照辩证的叙述方法对材料进行加工、叙述。这样就出现了难题:一是如果坚持辩证的叙述方法,理论要素的选择就不能随意,必须按照经济范畴的辩证发展自然推定;二是如果理论体系的展开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就必须有它唯一科学的逻辑起点,而这个起点范畴必须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必须是最简单、最一般、包含着社会主义一切经济关系萌芽的范畴。由于多年来始终未能解决这两个难题,既未能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达成共识,也未能做到按照辩证的叙述方法展开内容,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随意地选择内容,总是局限在政策与策略的解读与论证的层面,所以也就无法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解决基本原理缺失的问题?汤在新教授曾经运用马克思经济学“六册结构”方法构建过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应该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路,因而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②。

汤在新教授的方案是响应“《资本论》续篇探索”课题组专家们的要求提出来的。当时,《《资本论》续篇探索》的研究与写作已接近尾声,课题组专家一致认为,在基本上搞清楚“六册结构”计划的来龙去脉、基本结构与内容的基础上,至少应当以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的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汤在新教授在充分吸收课题组成员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上述方案。这个方案在正式发表前,曾经过课题组成员反复讨论。在正式发表时,汤在新教授对构建这个体系的方法论依据、现实依据做了这样的说明:“这个理论体系框架与‘六册结构’相对照,前半部分变化较大。首先,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变化,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转向考察社会主义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条件;其次,与此相关的,对价值、货币、资本的研究,侧重点不是揭示剩余价值,而是考察市场经济的运行。在这里,价值论不单纯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而且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后半部分是与‘六册结构’相一致的,但增加了新的内容,主要是当代出现的新的经济关系以及政府的微观规制和宏观调控职能等。总体来看,它是体现了理论要素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形成过程,考察的对象不是经济现象,而是其理论抽象,即经济范畴。因而,从内容、体系、形式看,它既不同于划分为微观、宏观两部分的只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也不同于那些着眼于现实描述和对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而可以认为它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直接关系到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在理论建设上具有更加紧迫的意义。所以,这个理论体系主要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经济的。”^[9]汤在新教授虽然已经在几年前离世,但他留下的这一方案及其说明很值得我们重视和认真研究,因为我们今天正在努力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实现途径。

五、结束语

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上都是本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可以被看作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多年来,中国学者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可以被看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这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构筑理论体系,而且理论体系的叙述方式都是对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政策、策略、方

略的解读和论证。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虽然被称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某国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新发展,但既缺乏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又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构筑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从而对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的解读与论证既缺少一个完整的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范畴体系与规律体系,又缺乏基本原理的支持。在这种条件下,以描述经济现象为主的西方经济学乘虚而入,攻城略地,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本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体制制度的不断创新以及全国各族人民苦干实干实现的,西方世界承认“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并争夺其理论解释权,试图将中国的成功解释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成功,中国目前还存在的问题,是因为中国贯彻西方主流经济思想还不彻底,这意味着,中国要发展,唯有全面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张进行彻底改革。中国要想主导和控制“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解释权与话语权,就必须把自己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发展模式,总结概括为能够为现实经济政策、策略、方略提供科学的解读和论证的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其能够有效地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从“具体—抽象—具体”研究方法,“分析经济关系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把社会经济制度各个层面的经济关系加工成经济范畴,然后再运用辩证逻辑方法构筑体系,进行理论叙述,全面揭示经济范畴、经济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从而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形成原理层面的政治经济学。一旦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就意味着形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学习和借鉴马克思经济学“六册结构”计划的理论体系构筑方法就成了必然“选项”。因为,马克思当年之所以能够做到从本质到现象全面解剖“资产阶级经济制度”错综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就在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

注 释

- ①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六册结构”计划的详述参见《〈资本论〉续篇探索》“第一章”和《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六册计划”的总体结构与内容探索》。^[1-2]
- ②汤在新教授的方案是一个涉及导论及商品和货币、市场竞争和生产价格、货币作为资本、资本作为货币(信用和金融市场)、企业和产权、分配、国家(或政府)、对外经济关系、世界市场等内容的理论体系。^[9]

参考文献

- [1]汤在新.《资本论》续篇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 [2]刘明远.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六册计划”的总体结构与内容探索[J].北京: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4):131-161.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5.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32.
-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 [8]B. A. 梅德韦杰夫等.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9]汤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05(1):26-32.

责任编辑:魏 旭

Methodological Logic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Zhao Lei

Abstract: To develop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basic logic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o adhere to the basic logic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s to adhere to the Marxist methodology rather than certain conclusions or view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t requires to grasp the core and logic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firm the theoretical realm of Marxist methodolog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views, and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contradic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connotation of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proceed from the plight of epistemology to criticize the popular view which thinks that dialectics is “juggling”.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Marxist Economics System for Constructing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Mingyuan

Abstract: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is inevitably an overall structure comprehensively reflect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bstract and concrete. It includes both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specifically study the economic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basic clas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China’s socialism, and the theories that specifically study the internal relations,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level and the world market level.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not only needs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at the abstract level to provide basic principle support, but also needs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at the concrete level to provide the services of interpreting and demonstrating realistic economic policies, strategies and general plans. To effectively meet such requirement, it should be the basic way to use Mar’s method of “Six-Volume Structure” to buil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ogic of Das Kapital and the Choic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Qiao Zhen

Abstract: How to use the theory of Das Kapital to explain the choic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is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discussion i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as Kapital reveals that capital can motivate people and has a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e forces. However,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economic imbalances inevitably caused by the capitalist relations ultimately determine the fate of capitalism.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renovated the logic of capital operation. It not only uses market economy to continue to motivate people, but also forms a new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under the socialist basic economy system. Such new mechanism not only reduces the uncertainty of market economy operation, but also expands the capacity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s a model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vident. Of course, some new problems also occur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tself and they need to be solved by gradually defining the system’s boundaries and improving its mechanism.

Criticism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ory of Means of 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Different Capital Views of Marx, Bohm-Bawerk and Schumpeter

Chen Yongqin, Zhang Junfu

Abstract: The “Cambridge Capital Argument” that occurr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revealed the contradictions existing in 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ory and most of these contradictions are related to means of production. It can be found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apital views of three economists, namely, Marx, Bohm-Bawerk and Schumpeter, that there is a delicat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ree capitalist views and the Cambridge Capital Argument. Therefore, we can reveal the serious problem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ory of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glects the contractual process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due to its excessive attention to the contribut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 while its negligence of 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money into means of production is exactly the root cause for Cambridge Capital Argument; and its negligence of the labor-capital contract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it to properly view the problem of capitalists exploiting laborers.